

书坛初探·名碑名帖临习系列

《石鼓文》临习指南

姜荣贵 编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书坛初探·名碑名帖临习系列

《石鼓文》临习指南

姜荣贵 编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鼓文》临习指南 / 姜荣贵编著. —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4.5

(书坛初探·名碑名帖临习系列)

ISBN 978-7-5314-6332-0

I. ①石… II. ①姜… III. ①篆书—书法 IV. ①J292.1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6017号

出 版 者: 辽宁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29号 邮编: 110001

发 行 者: 辽宁美术出版社

印 刷 者: 沈阳海世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50千字

出版时间: 2014年5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申虹霓

封面设计: 洪小冬

技术编辑: 鲁 浪

责任校对: 李 昂

ISBN 978-7-5314-6332-0

定 价: 35.00元

邮购部电话: 024-83833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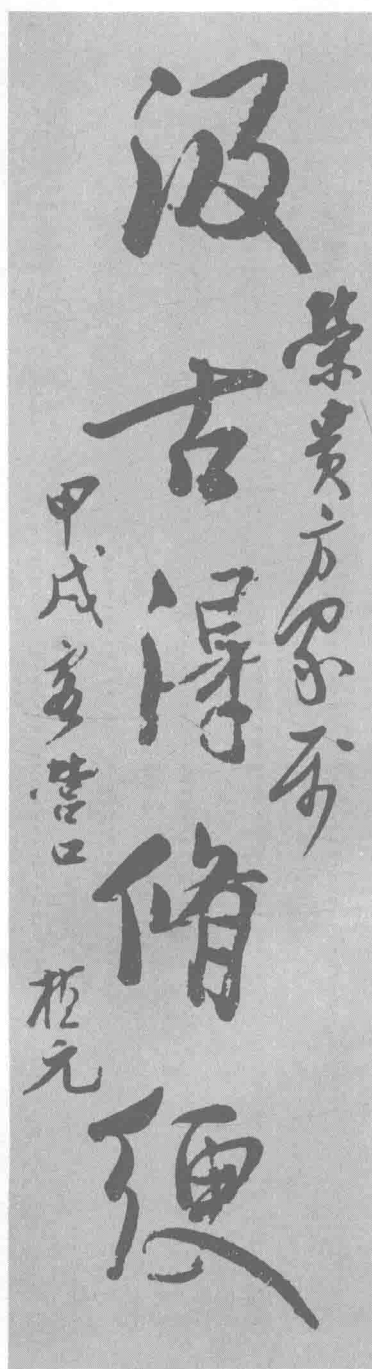
E-mail: lnmscbs@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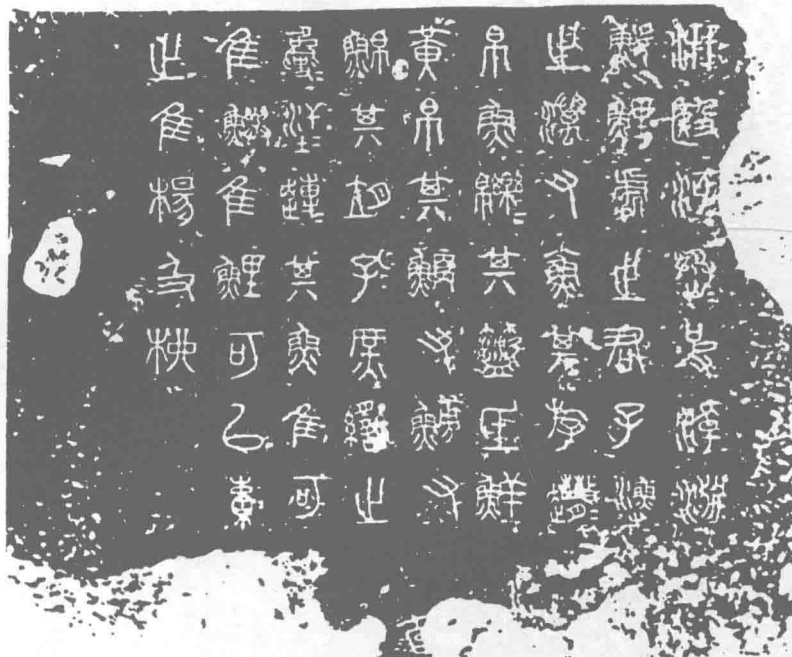
http://www.lnmscbs.com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出版部电话: 024-23835227

○ 著名学者、书法家于植元先生为本书题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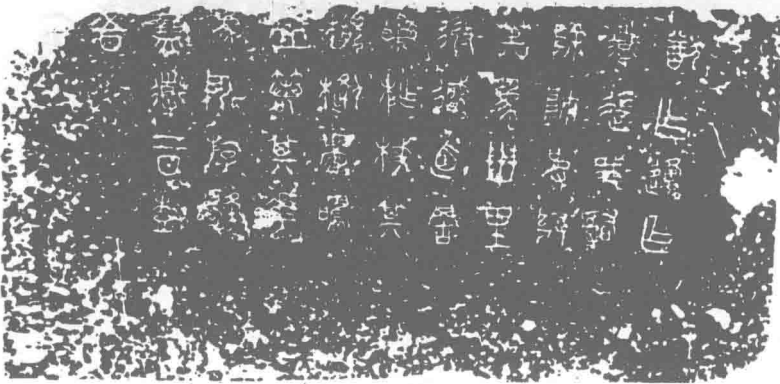
汧汭鼓拓片（局部）



鑿車鼓拓片（局部）



灵雨鼓拓片(局部)



作原鼓拓片(局部)



而师鼓拓片(局部)

目录

○ 《石鼓文》及其意义	一
○ 《石鼓文》	十一
○ 程质清注释《石鼓文》	五九
○ 吴昌硕临《石鼓文》	七一
○ 历代书家节临《石鼓文》	一一〇
○ 《吴昌硕石鼓文》笔法举要	一二四
○ 《吴昌硕石鼓文》构法举要	一三九
○ 《石鼓文》临法举要	一四四
○ 《石鼓文》集名言名句成语联语	一五九
○ 后 记	

《石鼓文》及其意义

(一)

中国汉字究竟产生于什么时代，目前文字学界尚无定论，但曾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则是肯定的。早在汉代，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由是文籍生焉。”认为是伏羲氏时代开始有了文字，这是一种说法。又，根据《史记·封禅记》所引管仲和齐桓公的对话，以及《韩诗外传》所载孔子登泰山的故事，早在无怀氏的时候，就已经“封泰山”，而管仲和孔子在泰山所看到的古代封禅石刻，只能识别一小部分。根据这些记载来看，我国文字似还在无怀氏之前，可惜这些远古的石刻文字，已无从考查了。再，另有一说法，文字的产生是在黄帝时候，由两位史官，一个叫沮诵，一个叫仓颉的“始作书契，以代结绳。”沮诵、仓颉所造的字，也是年湮代远，字迹无处可寻。只是南朝梁代任昉的《述异记》中，说是仓颉藏书台有碑文二十八字，是仓颉写的。到了宋代，《淳化阁帖》也根据任昉说法加以记载。不过，任昉的《述异记》其内容真假参半，并不十分可信，而编刻《淳化阁帖》的王著，在甄选名迹、辨别真伪上，后人对他也是颇有微词的。即使我国的文字和沮诵、仓颉有关，我国文字的产生应当还在黄帝之前，他们不过是在人民群众的创造、使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做了总结性的统一规定罢了。

有字迹可考、确凿可靠的，则是距今约三千年至四千年的殷商甲骨文。因为是刻在龟甲、牛骨、猪胛骨、鹿头骨等甲骨上的，所以叫做「甲骨文」。最初发现甲骨文的地址是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这里是司马迁《史记·项羽本

諸家古法帖五

卷五

諸家古法帖五
卷五

传说中的仓颉书

甲骨文



纪》说的：“项羽与章邯期于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遗址。小屯在安阳西北六华里，洹水绕其东北，商王朝第十代盘庚率其部属迁移到殷，都城就建在这小屯地方。

甲骨文，多记占卜的事，如征伐、出行、狩猎、祭

祀、疾病、祈祷等卜兆和纪事的文字，故曰「殷墟卜辞」或「殷墟书契」。多年来，经过不断发掘，甲骨文累计约十五万片，单字总数已达四千六百多。

甲骨文虽大多用刀刻成，但从书法的角度分析，它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从用笔上说，在甲骨文中已发现了朱书和墨书的痕迹，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毛笔之类的工具。这些朱、墨迹的用笔起止均显露锋芒，线条两端尖而中间略粗，可以看成是书法最初的用笔形式。从结字上看，甲骨文一方面具有了对称美或一字多形的变化美，另一方面又具有了方圆结合，开合揖让等结构形式。就章法而言，甲骨文多为纵成行，横则有列与无列并存，行款错落，大小变化，疏密有致。总而言之，因刀刻不易圆转，故甲骨文以方折为主要形态特征，而以尖细、挺劲为其笔道线条特征，加上甲骨文用于占卜，故笼罩了一层质朴又神秘的色彩。

因时代、刻者、用刀诸因素的影响，各阶段的甲骨文书也呈现出雄浑、秀丽、谨饬、率意、朴拙、工整等不同的风格。著名学者董作宾先生定甲骨文书法的艺术风貌为五期：

第一期：从盘庚迁殷到武丁。

这一期间的文字线条的行走，有雄沉、粗放的艺术美感，是商代整个甲骨文书法的起始期。书法（契刻）家有韦、亘、叡、永、宾等。

第二期：从祖庚到祖甲。

艺术特点是刀法工整，字距、行距井然不紊，书写形态秀美、明快。书法（契刻）家有旅、大、行等。

第三期：自康辛到康丁。

其书风已失去第二期工整、秀美的特点而变得比较涣散，布势的艺术风貌不如第一期与第二期，契刻者多半不具名。

第四期：从武乙到文丁。

运刀技法以劲健、峻拔为主，刻痕较深，但不凌乱，有一定的力度。书法（契刻）家有狄等。

第五期：从帝乙到帝辛（纣）。

是商代甲骨文书法的尾声。前一阶段技法相当娴熟，章法也很讲究，后一阶段，也就是商代将近灭国时，工整程度逊于前一阶段。

商代的金文亦具有与甲骨文同样的书法意味。金文，即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由于殷商时期钟、鼎在青铜器中占有特殊地位（钟为礼乐之器，鼎为权力象征），故后世称金文为「钟鼎文」。从时间上说，金文与甲骨文同时并存，金文自成体系而不受甲骨文的影响。在商代早期的金文中，有比甲骨文更多地表现了原始文字的痕迹和象形的特征。商代晚期铜器铭文较早期金文字数增多，一篇铭文最多达几十字。由于金文多在母范上写刻后浇铸而成，工艺过程繁复，因此其线条特征与甲骨文迥异，既丰满又柔韧，较多地保留了在母范上描写的文字的笔意。在章法上金文比甲骨文端庄而稳定，气势恢宏，线条凝重，形成特有的风格，并深刻地影响了西周的金文。

西周初期，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几乎都完全沿袭了

大孟鼎



殷商晚期的风格，其结构、形体与书写形态均是商代文字的继续，其书法艺术样式，主要是青铜器铭文书法。

西周青铜器铭文书法，文字内容较商代复杂。从内容来看，有纪念祖先、记载王命、战功、赏赐并作契约之用的，在篇幅上较商代铭文长得多，如康王时《大孟鼎》近三百字，后期《毛公鼎》四百九十七字。

由于铭文铸刻在贵重的青铜器上，又是为了炫耀家世并留存于子孙后代，因而对文字的书写有很高要求。

初期铭文如武王、成王、昭王时代的肥笔居多，铭文部位也不明显，以后的《虢季子白盘》、《南宮乎钟》的铭文部位已能使人一目了然。铭文部位的变化，表明铭文作为一种书法样式，已具有更高的审美意境和艺术欣赏价值。

毛公鼎



西周铭文书法带有明显的毛笔笔意，出锋、敛锋的形态浓重，另一种则是有如「玉筋篆」一类的笔意。

西周铭文书法，可称为典型者有：恭王时代的《史墙盘铭文》，结体宽博有度，间矩不素而谨严。夷王时代的《虢季子白盘》，用笔秀润。西周后期的《散氏盘》行笔奇宕多变。宣王时代的《毛公鼎》，行笔有飘逸之态，但不失早期铭文之法度。

公元前七七〇年，周平王迁都洛阳。从此，历史发生了变化，五百年间社会动荡，诸侯争胜，相互间的征伐使统一的西周四分五裂，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书法发展过程处于奠基期的繁荣阶段，虽然变乱，却使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有了交流、汇合的机会。此时的秦国因地处西周本土，所以秦系文字仍沿着周文字的轨迹发展，而其他各国的文字都在不同的艺术追求下，朝着各自的审美趋向发展，并逐渐形成地域书风。这时的民间书法也很活跃，加上毛笔、简牍、帛等各种书写材料的广泛应用，刺激着书体的嬗变，出现了为商代、西周所未曾有过的兴旺发达景象，因而使春秋战国时期的书法艺术形成了绚烂多彩的局面。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书法在艺术上力求更新，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境界。列国都有自己所铸造的青铜器，其中许多铭文书法相当精彩，又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形成当时各有艺术特点的不同书风。从地区来看，有南北书风之分，北方书风以中原地区为主，南方书风在自己原有文化基础上又受中原文化熏陶，形成一种新的书风。

中原地区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以秦、宋、郑、晋、齐、鲁等国为代表，铭文书法厚实、朴茂，带有西周铭文书法传统。南方书风以长江流域的中下游一带为中心，书法秀逸，其间也有奇宕怪诞的书体出现，如以鸟虫为装饰变形的手段，曲折盘绕，婀娜多姿，富有图案之美的鸟虫篆等，这种书风以楚国、徐国、蔡国以及吴国、越国之铭文书法为代表。

这一时期的石刻文字也已开始形成独特的格局，虽然

史墙盘铭文



虢季子白盘



散氏盘



诅楚文



比较金文、铭文显得甚为少见，但已经逐渐由铜器向石刻转移了，著名的石刻文字书法有秦国的《石鼓文》、《诅楚文》，中山国的《河光石刻文》等，其中《石鼓文》是最受注目的。

(一)

何谓《石鼓文》，《石鼓文》又名《猎碣》，从唐贞观年间出土，共有十个馒头形的石头，体圆而上稍平，每个石头的圆柱形竖面刻古诗一篇。篆书，字大约三点五—四点五厘米。据北宋拓《先鋒、中权、后劲》三本相核对，尚存四百八十八字，重文四十四字及残文十五字均不计在内。

一千三百余年来，历代文人墨客、专家学者，对《石鼓文》的著录、歌咏、音训、注释等研究经久不衰，有关石鼓诗文内容、文字释读、排列顺序、出土地点、刻石年代、拓片真伪、史料和艺术价值等诸多方面的探讨与争论，也一直不休，一件文物能受此殊荣，在我们这个泱泱文物大国里，也属罕见，所以清康有为称其为“中国第一文物”。

关于《石鼓文》的发现，最早见著录于唐代。贞观年间（公元六二七—六四九年）吏部尚书苏易记拓本石鼓卷首说：“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李嗣真云：“史籀堙灭，陈仓籍甚。”张怀瓘《书断》云：“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与古文小异，后人以名称书，谓之籀文。……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叙（周）宣王畋猎之作，今在陈仓县。”近代学者考证认为，古陈仓即今日宝鸡市区东南十里的石鼓山。

唐初，石鼓出土以后，立即引起轰动，此后，随着朝代更迭，它屡历转徙，饱经风雨沧桑。

这十通石鼓中，最大的釜车鼓高六十厘米，周长二百三十五厘米，重五百五十公斤，最小的田车鼓及半残的作原鼓重三百公斤，其余的7鼓均在四百公斤左右。在当时

起重工具落后的情况下，搬动实在不易。可是，由于它被视为国宝，从唐初至宋初，就经历了三次大的搬迁。

第一次在唐至德二年，由陈仓山北阪（即今宝鸡市石鼓山）迁于雍城（今凤翔县），埋于城南二十里处。

第二次是四十九年后，韩愈的故人于唐宪宗元和元年重新挖出石鼓，元和十三年，郑余庆任凤翔节度使期间，把石鼓迁入凤翔城内孔庙。

第三次是唐末，五代之乱，战火不息，生灵涂炭，石鼓被散弃于凤翔之野。北宋初年，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经多方查找，终于把九鼓找回，置于府学门庑下，唯缺“作原鼓”，皇祐四年（公元一〇五二年），向传师任凤翔知府，找回亡鼓“作原鼓”。此时，该鼓上半截已不知去向，只留下下半截且已被凿成白窝。石鼓自五代之乱散失，至皇祐四年找回最后一个亡鼓，历时一百三十四年，找回的“作原鼓”每行仅存四字，皆断续不成文。

唐初至宋初，石鼓在其故乡宝鸡、凤翔一带经过三次聚散之后，又开始了全国范围的辗转流动岁月。

北宋大观年间（公元一一〇七—一一一〇年），宋徽宗搜集天下奇珍，亲自下诏将石鼓由凤翔运至京都汴梁（今开封），用泥金填字，不许人再摹拓。为保护石鼓，先放在辟雍，后移至保和殿。

北宋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金兵攻克汴梁，掳掠宋室珍宝，又将石鼓运到燕京（今北京），用刀将石鼓文中的泥金刮出，审度石鼓真面目。

南宋端平元年（公元一二三四），元军攻破燕京，石鼓被抛于废墟之中。元银青荣禄大夫、御史大夫、世袭王姓千户（宝鸡县魏镇人），看到故乡宝物遭此厄运，十分痛心，遂下令将石鼓运置于北京孔庙庑下，使石鼓再免于难。

元初将金之枢密院改为国子监，王楙将石鼓置于此院庑下，后来迁都北城，另立国子学，由虞集建议，又迁入新国子学大城门内，以砖砌座，外加木栏保护。经明清直至民国初期，石鼓一直保存在北京国子监内。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人大举侵略，东北沦陷，华北告急，民国

政府将石鼓秘密运至上海保存。「芦沟桥事变」后，上海吃紧，由故宫博物院马衡将其迁至四川峨嵋山。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政府将石鼓由峨嵋运回南京。一九四八年古物北返时，运回北京。途经宝鸡时，特意停放三天，让故地乡亲重睹国宝风采。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逃往台湾，石鼓也被列入运走的宝物名单，由于时间紧，石鼓重，终于未成。新中国成立后，石鼓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一直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石鼓在唐初被发现后，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并开始著录其事，也有人开始考证其出土地点，刻石年代等等。

关于石鼓最初的出土地点，唐李嗣真《书后品赞》谓：「仓颉造书，鬼哭天惊，史籀埋灭，陈仓籍甚。」首次记载石鼓出在陈仓（即宝鸡）。玄宗开元年间张怀瓘《书断》谓：「甄丰定六书，二曰奇字是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叙宣王畋猎之所作也，今在陈仓县。」再次记述了石鼓在陈仓县。诗人杜甫《赠李潮八分小篆》云：「仓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传生八分。」肯定了上述说法。后来的元和年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等书记载的「石鼓出在天兴县（亦可同凤翔县）二十里许」则表明了石鼓搬迁后曾经存放过的地方。

宝鸡市博物馆副研究员李仲操先生研究了历代关于石鼓的著作和当前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对唐代石鼓著作作了年代排比，发现自石鼓出土至唐至德二年，长达一二〇余年的时间里，所见著录都记石鼓本在陈仓，并再次得出结论：唐代早期所记陈仓，是石鼓的出土地。那么，石鼓究竟出于陈仓何地？李仲操先生也对唐代宝鸡、天兴二县的分界线作了调查，又依据府、县志和陈仓石鼓山石鼓寺碑文记载，以及石鼓山当地民间关于石鼓的传说，对照石鼓文所记地望，从而搞清了石鼓具体的出土地点是今宝鸡市郊东南十里渭河南岸石鼓山的石鼓寺处。古寺旁的茵香河谷遍布与石鼓石质相同大小近似的花岗岩大圆石，可知石鼓应是就地取材制成。此外也证明，此处曾是秦人猎祭活动最频繁的一个地点。

关于石鼓的刻石年代，即石鼓被定为秦的刻石，始自郑樵，他在《石鼓音序》中肯定地说：「观此十篇，皆是秦篆」，奠定了石鼓为秦刻石论点的基石，郑樵以前的人，多称石鼓为周宣王时物，或称宣王之鼓、成王所刻。到了现代，对于《石鼓文》为秦刻石这一论点，自马衡先生《石鼓文为秦刻石考》、郭沫若先生《石鼓文研究》发表以后，人们已无异论。

但是，《石鼓文》究竟刻于秦的哪一代？即确切年限，尚难统一，至今学术界存有争议：

巩丰主张在秦襄公之后，秦献公之前，即公元前七七〇—三六二年。

马衡主张秦穆公之说，理由是：秦自襄公有功王室，得岐西之地而列为诸侯，至穆公始霸西戎，天子致贺。石鼓文记田猎之事，兼其车徒之盛，又有颂歌天子之语，并证以秦公簋之字体等等。

震钧在《石鼓文集注》中主张秦文公东猎时，即公元前七六三年所作，主此说者至今仍不乏人。

郭沫若主张秦襄公之说，并把石鼓之作断定在秦襄公八年，这一说法流传最广，影响较大。

唐兰先生首先主张秦灵公三年，后又认为秦献公十一年。程质清先生认为《石鼓文》十篇最早刻成年代，为秦惠文王三年至十三年，即公元前三三五年至三二五年。

李仲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秦宣公时的刻石，为秦宣公四年（公元前六七二年）之作。根据是：①《史记·封禅书》载：「秦宣公作密时于渭南，祭青帝。」②《水经·渭水注》载：「秦宣公四年作密时于陈仓北阪，祠青帝焉。」据此知密时地点是在渭南，陈仓山北阪，与石鼓出土地石鼓山同是一个地方。密时作于秦宣公四年（公元前六七二年），则石鼓刻石应在今年，他还运用石鼓文中的记载与史实互证，用石鼓文中的干支日与史实对照，确立了自己的论点。

关于石鼓的排列顺序，为研究方便，十通石鼓均有命名，依据石鼓刻石现存文字的前二字而定，学者们对此取

得一致。但在排列顺序上由于研究观点的不同，始终未得到共识，以下举例可以说明：

本书所采用的是安国和王厚之的排列顺序，即①吾车②汧毼③田车④銮车⑤灵雨⑥作原⑦而师⑧马荐⑨吾水⑩吴人。吴昌硕临《石鼓文》也同此顺序。

石鼓在唐初发现以后就有传拓，如《碧落碑》有许多字是引用石鼓文的字。苏勔在石鼓拓本上题过叙记。韩愈

	安国	薛尚功	潘迪	向传师	郑樵	王厚之	震钧	郭沫若	程质清	李仲操
吾 车	1	8	6	5	3	1	1	6	3	1
汧 毼	2	5	7	4	1	2	9	1	2	4
田 车	3	3	8	3	4	3	2	7	6	2
銮 车	4	4	9	2	5	4	3	8	4	3
灵 雨	5	9	10	1	8	5	8	2	8	5
作 原	6	7	1	10	2	6	5	4	7	6
而 师	7	1	2	9	9	7	10	3	10	9
马 荐	8	6	3	8	7	8	4	9	1	10
吾 水	9	2	4	7	10	9	7	5	9	8
吴 人	10	10	5	6	6	10	6	10	5	7

的《石鼓歌》云「张生手持石鼓文」，又云「公从何处得纸本」。韦应物《石鼓歌》云「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黑白分」。因此证明，石鼓在当时即有许多拓本。但是苏勔又云「岁久讹缺，韦应物亦云「风雨缺讹苔鲜湿」。因此可知原石发现时即有剥泐。北宋司马池、向传师以后又有传拓。到金人将其原石北迁，当时不可能传拓。元初移到国子学以后，又有传拓，但经舟车运载，剥泐更甚。以后由元末至明清之间均有剥泐。乾隆年后至今日并未损坏一字，是由于清代管理者的重视，以及南迁时包扎得当之故。

石鼓文拓本在唐代虽有记载，可是未曾流传下来。就是北宋拓本，流传下来也很稀少。在清末发现明安国「十鼓斋」中有三种宋拓本，分为《中权》、《先锋》、《后劲》，抗日战争前夕售予日本人。秦文锦藏一本，为元初拓本，亦为安国旧藏，秦氏号称宋拓本，听说后来也卖给日本人。香港某人存一元拓本，国内现存者为明代拓本。因为石鼓文善本太少，故以前收藏家将明拓称宋拓，乾隆年拓本称之为明拓。现将各时代拓本不同之剥泐情况记载如下：

北宋拓本：一鼓首行，首一「遘」字右竖笔末未与石花连。四行末「鹿」字，存上半。五行「君子之求」之「之」字末笔右半未泐。七行末「遘」字右下大半存。十一行首「来」字尚清晰。三鼓首行「勤」字右半力字未泐。四鼓四行「徒」上「敕」字未泐。七行「阳趋六马」之「六」字可辨。八行「遘」如虎」之「遘」字未泐。十行末「允昇」二字上多「遘」字上半和「蓰」字下半。五鼓首行「霖雨」二字上多「癸」字大半。二行「流」字下多「逶迤涌盈」四字以及「谋」字上半。三行「济君子既涉涉马」七字未泐。四行「流湑」三字未泐「泊泊」字下「蓬」字未泐。五行「舫舟西归」四字未泐。七行「佳」字上多「汤」字。九行「于水一方」上多「广」字。十行首多一「勿」字，十一行「其数其」三字以及「事」上半均未泐。七鼓首行「而」字下「师」字存而未大损。二行「弓」字下多「矢孔庶」三字。三行「左」字上多一「以」字。四行「滔滔是炽」上多「驂」

元早期拓本：一鼓九行「麋鹿」二字尚可辨。十一行「读射」二字亦较清晰。二鼓、三鼓与北宋拓同。四鼓二行末「矢」字撇笔完好。三行「四马」二字清晰。四行「孔」字下半与「庶」字上半未损。五行「宣搏酋车载道」六字清晰未甚损。六行「如」字未泐，「章原湿阴」四字清晰。七行「阳」字上半与「参参」字未泐，「马」字未损。八行「如」字未泐，「虎兽鹿如」四字未损。九行「多」字未损，「贤迪禽」三字笔道未损。十行「允异」二字亦完好。五鼓二行存「流」字大半，「漾」字中间。三行存「涉」字中间。四行存「泊泊」字大半。六行存「自廓达驳」四字。七行「以道」二字上「佳舟」二字未泐。八行「极深」二字上「阴或阳」三字未泐。九行「一方」字上「于水」二字未泐。十行「奔」字上存「之」字右下半及「其」字之全字。七鼓首行存「而师」二字。二行存「弓」字。四行「是」字上「滔滔」二字未泐，下「炽」字左下角未损。六行「来」字上「晃肝」未泐。八行「天」字左半未损，上边还存「乐」字之大半。八鼓损坏过甚，只存三行之「散散」二字。四行「其」字下少半。九鼓首行「既潜」二字清晰可辨。二行「道」字清晰。

明初拓本：二鼓首行「汙」字，二行「銀」字均未泐。五行「黃帛」二字未損。六行「鯤其」之「其」字未損。八行「可以」之「以」字尚存左大半。九行「及柳」之「柳」字尚存右下角。四鼓五行「舊車載道」之「道」字未泐。九行「多」字尚存大半。十行「允昇」二字未損。八鼓，「攸攸」字与半「其」字均泐。十鼓。七行与八行之间未損，故七行「大」字完好。以后至明中期拓本，则二鼓首行「汙」字，二行「銀」字已泐，然「黃帛」二字未損，故一般称「黃帛」二字未損为宋拓，非是。

近年，还见到香港寄居之上海某君藏八鼓尚存「放」字者一本。

石鼓文原文七百余字以上，现仅存字二百七十二个。自古以来，拓片的真伪，存字的多少，成为占有资料多寡、研究价值大小的关键，而为石鼓专家所关注，以至许多渔利之輩在拓片上大施手脚，形成鱼龙混杂，真假不分，给研究者增添了难度。

8

收藏的三个拓本是我们见到的最早且流传最广的拓本，确为北宋年间真拓，可与欧阳修《集古录》“谓其勒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字”，及梅圣俞“四百六十飞凤凰”之句相合。另「先鋒本」存四百八十字，「中权本」存字五百，「后劲本」存四百九十七字。安国先生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兼印书家，他曾经印行过好些古籍，也喜欢收藏石鼓文拓本。他收藏的「先鋒本」纸墨古朴，为姑苏曹氏藏本，「中权本」得自某相国之后，为宋徽宗二年「赐本」。「后劲本」得自故内废帖堆中，乃为旧「贡本」。为得到这三个拓本，安国先生用了二十余年时间，历尽艰辛，耗费达万金，终于取得石鼓精拓，如愿以偿。拓本到手后，他视若珍宝，秘不示人。并将其心爱的天香堂藏书楼更名为「十鼓斋」，将石鼓文拓本作为传家珍宝，在其前后册页上写下了「神物护持，垂诸百世」，「天家墨本稀世珍，愿我子孙永为宝」。

至清道光年间，安氏后辈家道中落，拆售天香堂，在梁上发现诸石鼓文拓本。其后拓本转入锡山沈梧之手，几经重金倒卖，辗转流落，到抗日战争前夕，终于被早就对三个拓本垂涎欲滴的日本三井银行通过文化掮客河井仙郎重金套购。

一九三二年秋，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在东京《文求堂》书店看见了「后劲本」拓本照片，原是三井的儿子借给朋友后流散在外的，郭沫若据此写出《石鼓文研究》一文。一九三六年夏，郭沫若又不惜以自己珍藏的甲骨文照片，换回了河井仙郎的安国先生三种拓本照片。郭沫若复制了河井的照片，对《石鼓文研究》进行了修改补充，整理完毕，全部资料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发表，发表的这套宋拓石鼓文照片，便是当今海内外学者公认的「最完全本」，自然也引起了轰动。

一九四五年，美国对日本东京进行了大轰炸，河井仙郎被炸死，住宅化为灰烬，石鼓文照片不用说也一同被毁，三井所收藏的三套石鼓文原拓本是否还安然无恙？如果也被炸毁，那么，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中所留存的

石鼓文拓本照片，便只好称为「孤本」了。

作为「中国第一文物」的石鼓文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首先，《石鼓文》是先秦史诗。为什么说呢？请认真注意这十枚石鼓的文字内容。

1. 吾车鼓：首言车乘坚固，良马整齐，次言公卿游猎之车，弓矢精良，猎获丰美。是一篇歌颂君臣以狩猎的名义得意洋洋地巡视属地，耀武扬威，慑服百姓与邻国。所谓游猎，实质近似于现代的军事演习，这时的秦国体制已初具规模。

2. 汧谿鼓：赞颂秦地水利优越，显耀地利条件优良。

3. 田车鼓：是纪事颂德的篇章，首先叙述车乘严饰，将士精良，整装出发的盛况，然后叙述秦之有陕，是周天子所赐和从西戎、犬戎锋镝下夺回的。再叙述秦生俘晋君后，本想杀以泄愤，后因人说情，乃释晋君与盟之事。

4. 盩车鼓：叙述继「吾车鼓」后又一次大规模狩猎。首先标明盩车，显示出一派君主气势。这时的秦国已相当强盛，有省车巡视和众多的徒骈相随。且有宣布搏击命令，队伍秩序井然，护卫安如屏障，临阵豫如，勇武善博，卿士将佐，贤才济济。

5. 灵雨鼓：此篇首叙灵雨，喜甘霖也。盖乘雨后水涨，将兵乘舟渡河伐晋，以报复散谷之败绩。

6. 作原鼓：晋献河西八城后，秦对新领地人民采取恩威并施的统治方法。故从司事、法网、刑罚、优待、训导，以至树立「嘉石」，纪颂其抚治新拓地人民的历程。

7. 而师鼓：称颂嗣王位事，这是历史上对秦称王的最早记载。文中追叙先秦事迹，借周子致贺致酢的声威，对内用以鼓舞卿士的斗志，对外借以威慑邻国的人心。

8. 马荐鼓：此篇虽仅存十五字，但「天虹」二字连接，极为重要。天上有霓虹，说明降雨量充足，雨水充沛，则草木滋繁，故荐指芎等水草、灌木，丰美繁茂，具备良好的畜牧条件。

9. 吾水鼓：为赞颂治理清平政绩的篇章。实行了一系列的建制改革，推行新政，建立律令等重大措施，获得

显著成效，以期达到长治久安。

10、吴人鼓：此篇指吴山或吴阳野人感谢秦国君不究食善马之恩，争死报德事，是颂扬秦国君深得民心，其后必昌的颂辞。

上述十枚石鼓，刻先秦光荣历史的史诗十篇于十鼓的圆柱形半面，这个「鼓」很可能作为陈放祭品的供座，秦国君以诸侯称王，举行盛典，显耀先秦光荣历史，用以光宗耀祖，振奋人心，所以说，《石鼓文》是先秦的史诗。《石鼓文》也是石刻之祖，是篆书承前启后的纽带，为什么说呢？

因为一，《石鼓文》刻石不是碑的形式，而是十枚馒头形的石鼓。这个问题，除上面所说的十枚石鼓可能作为祭天时陈列祭品的供座外，还有一个生产力与工艺发展的过程。作为最早刻石的形制，与最早使用的舟、车形制一样，都是极其简单，是很自然的。江苏、武进、偃城出土的「独木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再看晚于《石鼓文》一百多年的《秦·泰山刻石》，又是刻在四方而上窄下宽的柱形石头的四面，也不是碑版。这形制的不断进化，意味着刻石工艺水平的逐步提高，从原始的生产工具和形制，都说明《石鼓文》是最早的刻石文字，所以被学者称为「石刻之祖」。

《石鼓文》与金文不同，《石鼓文》直接书丹上石，行格整齐，字体宽大，石面平滑，与书写帛素仿佛。金文则是范铸于钟鼎彝器上，器形弧弯复杂，文字安排有一定的局限性，字形笔意在刻制模范浇铸成型等生产流程中或多或少地有所变形。《石鼓文》中许多字，都与小篆结体相同或很相近，同时还有一些繁体字夹杂其中，这是金文臻于成熟，发展进入小篆演化中尚未定形。晚于《石鼓文》一些年并由大篆演化为隶书的《青川木牍》同样是篆隶繁简互相夹杂，《诅楚文》字形结体也与《石鼓文》很相近，这都是演化过程中的风貌，为我们留下承上启下的脉络。所以说《石鼓文》是「石刻之祖」，是篆书承前启后的纽带。

除上述意义外，《石鼓文》还具有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它的诗形式完整，遣词用韵、情调风格都和《诗经》相吻合。郭沫若先生在《石鼓文研究》中对它有高度评价，说「石鼓诗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民族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诗经》的真实性。」石鼓诗是没有收进《诗经》的，却恰恰与《诗经》相印证，朴实无华，开门见山，把秦公的狩猎、骑射、出巡道得质直晓白，充分体现了秦文化的特点。

《石鼓文》记的是我国春秋时秦国君的一次狩猎活动，成为秦史研究和古地名、古动物、古植物、古地理环境等方面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史料。

正是因为《石鼓文》具有上述重要的意义和崇高的价值，所以自唐代发现后，备受文坛书坛的赞赏。张怀瓘《书断》称赞其书法变化之佳妙，「如彼江海，大波洪涛，如彼音乐，千戚羽毛。」甄丰定六书，三曰：「奇字是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赞颂《石鼓文》的结体美妙，「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韦应物、韩愈、苏东坡均作《石鼓歌》（详见《石鼓文临法举要》）称颂《石鼓文》。黄庭坚云：「石鼓文笔法，如珪璋特达。」赵明诚《金石录》云：「《石鼓文》字画奇古，决非周以后所能到。」《复斋碑录》云：「《石鼓文》……足以追想三代遗风，而学者因可以知篆隶之所自出。」赵宦光云：「《石鼓文》信体结构，自成篇章，小大正欹，不律而合。至若勾引纷披，作云舒卷，倚倚磊落，如危岩乍缺。施用无定方，立旁有成法。圆不至规，方不至矩，遂为书家指归。」康有为云：「《石鼓文》如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

《石鼓文》不朽！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冥。」（韦应物句）

「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韩愈句）

「何人作颂比《嵩高》？万古斯文齐《峒峤》。」（苏轼句）